在改革创新中扩大“思想供给”

——访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唐洲雁

新论语

理论访谈

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许多探索，是在传统体制机制下进行的，每一步的突破都很艰难，特别是在选人用人、职称评聘等方面。期待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能赋予社科机构更多选人用人等方面的自主权。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就此，我们采访了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唐洲雁研究员。

本版编辑(以下简称“编”)：2016年，中央提出“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建设新型智库”。在这两方面，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从业者，应具有什么样的作为和担当？

唐洲雁(以下简称“唐”)：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赶上了好时候。特别是2016年，中央和省里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多种政策利好因素叠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迎来了崭新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姜异康书记主持召开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部署落实，为我们细化了目标，明确了任务。

二是新型智库建设方兴未艾。中办、国办出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我省出台实施意见，对智库建设的目标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对山东智库建设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

三是科研改革带来政策红利。2016年以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科研改革举措，涉及到科研机构的体制机制、项目管理、人才发展和分配政策等方方面面，构成全方位的配套改革。我省也出台了具体的配套措施，营造了有利于科研创新的良好氛围。

可以说，我们处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赶上了一个需要创新而且一定能够创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社科人一定要担当作为，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过去一年，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开展了“创新工程”，您觉得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应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唐：我个人体会，实施创新工程不仅要搞好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而且要加强科学领导，树立正确导向，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

一是切实抓好党对智库的领导。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与创新工程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对创新团队和创新岗位考核必须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出了问题就一票否决。以山东社科院为例，2016年我们结合巡视反馈意见，新制定、修订制度18项，进一步规范科研活动，以良好党风学风保障了科研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制度纳入到创新工程文件汇编中去，把创新工程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在推进创新工程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精品导向。山东社科院在原有的考核评价基础上，从2016年度开始，把团队人均精品得分作为重要指标，激励科研人员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真正把科研导向转到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上来。去年成果总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精品成果产出和精品成果率却增幅较大。可见，精品导向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三是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学风是科研单位的命脉所在，保持优良的学风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早在创新工程启动之初，我们就在创新工程制度中设计了学风考核评价环节，对创新团队和创新岗位实施一票否决。团队重大支撑项目有学术不端行为的，整个团队退出创新工程；团队成员个人有学术不端行为的，退出创新团队。通过一系列约束机制，不断强化科研人员的自律意识，不急功近利，不哗众取宠，引导大家扎实调研，冷静思考，推出原创性成果。

2016年是山东社科院完整实施创新工程的第一个年度，从科研成果产出上来看，在2015年的基础上，我们又实现新的突破。全年成果数量在800项左右，其中精品成果就达到175项，科研人员人均1.25项精品。

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在学习借鉴中国社科院和兄弟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就率先启动创新工程，先行先试，为省属科研院所探索改革新路。经过两年来的实践，可以自豪地讲，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科研规律、符合山东社科院院情的发展道路。

编：实施创新工程，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了难得的契机，很多科研机构可谓“面貌一新”。但也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反映，现行的体制机制，还存在很多束缚创新的地方，亟待政策“解绑”。

唐：和实施创新工程之前相比，我们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有些变化甚至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料。但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对照省委对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对照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这些标杆，我们还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比如说，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问题。依托创新工程体制机制，我们在人才引进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大，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保障。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才短板还没有补齐，与研究需要相比，高层次人才和省情专家数量还不足，制度性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迄今为止我们连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都没有，这与我们争取走在全国地方社科院前列、进入国家高端智库的目标是很不相称的，也与全省高校系统正在努力建设“双一流”的大环境是无法匹配的。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科研机构与高校同等重要。因此，抓紧建立健全全省科研机构包括社科机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配套政策和措施，势在必行。

再比如说，体制机制的问题。创新工程的许多探索是在传统体制机制下进行的，每一步的突破都很艰难，特别是在选人用人、职称评聘、经费报销等方面，我们还有进一步改革创新的必要。拿职称评聘来说，省里把职称评聘的自主权交给我们，但岗位设置仍然受到控制，不能根据我们研究工作需要进行自主调整。正因为如此，我们热切期待全省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给社科机构更多选人用人和职称评聘的自主权。

编：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年”，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供给、思想供给。那么，在这个“深化年”，哲学社会科学应如何做好自身的供给侧改革？

唐：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创新无止境。结合中央和省里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部署要求，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和科研院所改革，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以改革创新的心态迎接新一轮的挑战。改革是创新工程的助推器，是对创新工程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有助于进一步为科研“松绑”。通过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科研组织运行机制、完善科学的科研考核评价制度、做大做强山东智库联盟、打造高端的学术交流和对外宣传平台，进一步激发科研创新活力。

二是探索科研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按照山东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统一要求，完善内部制度，积极探索开展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管理层各负其责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按照去行政化的要求，在人员岗位设置、公开招聘人才等方面改革创新，激发科研创新活力和管理效能。

三是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暂行)，盘活选人用人机制。《办法》对加强社科理论单位选人用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有助于我们建立起社科理论单位特点的管理制度。

四是进一步完善智库组织运行机制。要遵循智库发展规律，加强顶层设计，在巩固优势与特色基础上，调整优化内部机构设置，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设置新的研究机构，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构建适应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五是完善专业技术岗位自主评聘改革。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改革完善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与聘任工作，将创新工程确立的精品导向在职称评聘工作中落地，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营造出精品成果、出优秀人才的良好风气。

政治生态与干部成长

□ 王玉堂

要以“关键少数”引领“最大多数”，努力形成领导示范、骨干带动、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全面净化政治生态的强大合力。

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需要有一个好的自然生态;干部的成长也是一样,需要有一个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干部成长与政治生态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干部的健康成长就无从谈起;政治生态影响着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而干部的为政行为又反过来对政治生态产生影响。

当年的延安就是很好的例证。延安本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之一,远离城市文明,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但是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却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1940年代初期就已形成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吸引力?对此,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答案:“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换言之,就是延安的政治生态好!也正是因为当年延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使这里成为群英荟萃、群贤毕至的革命圣地,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先锋战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优秀领导人才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

当前,我们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全面从严治党,为干部成长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补足精神之“钙”。干部队伍过硬,首先是思想素质过硬;政治生态纯净,首先是干部思想纯净。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用好思想建党这个法宝,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补足精神之“钙”,固好思想之元,努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百毒不侵之心,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体现在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上,体现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体现在“砍头不要紧,只有主义真”的执着追求上,体现在“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具体行动上。理想信念坚定了,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自然就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风狂雨急时,立得定”。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治吏”的核心是“吏治”,即用人。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用人导向决定着干部的努力方向,影响着政治生态的演变;有什么样的用人导向就有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因此,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着力点,必须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真正使选出来、用起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以选人用人上的风清气正保证和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要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风尚、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的强大势场、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既是政治生态建设的主体,又是政治生态系统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在政治生态形成、演变过程中,居主导地位,起关键作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一方面,要教育干部坚守正道、弘扬正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恪守规矩,始终在大局下行动、在合作中履职,努力增强合作共事、一起干事的党性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自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三严三实”的崇高境界和特别能担当、特别能担责、特别敢负责的模范行动,改善合作共事的小环境,优化一起干事的大气候,进而形成一个部门、一个地方良好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要以“关键少数”引领“最大多数”,努力形成领导示范、骨干带动,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全面净化政治生态的强大合力。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说过,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过去如此,现在更是这样,领导干部对政治生态和社会成员的影响举足轻重。

要有制度的硬约束。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用好制度治党这个利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制度的硬约束和“热炉效应”,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党内政治生活的高质量,保证党内政治生态的纯洁、纯净和清爽、清朗。要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领导班子成员要增强大局观念,会议讨论时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按照分工抓好落实,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还要融合

□ 江 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过去我们更多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只有在更深层次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才能真正完整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当代中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关键，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而这一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长期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只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忽视了它与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化的时候，中国刚刚推翻皇权专制主义统治，面临着“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任务，因而当时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的思想，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这一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寻求融合。

促使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局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开始反思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并对之有了更为冷静、理智的态度。这种反思和重新认识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指“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应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文化“土壤”的内核是儒家的道德主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从思想文化上看，理应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融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局限。今天看来，这种融合不仅必要，而且事关重大，因为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中国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才是本原意义上的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框架性的，并没有使这种构想具体化为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吸取滋养来使之丰满和完善并可以践行。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融合起来，使这种融合的成果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文化，是我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及作为其核心的社会主义，其主旨就是使人获得解放，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建立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段话是对儒家学说全面而深刻的概括。儒家道德使以前的礼在仁和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三者浑然一体，从而给礼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理论证。儒家还将三者落实到个人、统一于个人，建立了一整套个人修身学说，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从儒家整个道德体系来看，仁是核心，义、礼是实现仁的内在和外在的保证(以义正我，以礼制我)。

仁的主体是人，儒家重视仁实质上是重视作为其主体的人成为仁者，仁、义、礼都指向这一目的，也落实于这一目的，整个儒家道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构建起来的。广义上的仁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为道德之人。在儒家看来，仁者是真正意义的人，也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因此，在儒家那里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人，成仁、成为道德之人与成人是同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成人是儒家道德的旨趣或意旨，而先秦的儒学体系就是旨在成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主旨就是要回答什么样的人才是仁者和怎样才能成为仁者这两个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在深层次上存在着一致性和相通性：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的完善和发展问题，即“成人”的问题；两者都把人的完善和发展看作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两者都认为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这种一致性和相通性，为两者已有的融合和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而融合的目的则主要是批判地从儒家道德主义中吸取基本精神和合理元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和元素在今天看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人要成人，首先必须成为道德之人。人的解放是从受压迫和奴役中解放，不是从道德中解放，道德可能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的力量，但那种道德是异化了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人生活的智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这样的道德内涵正是儒家道德主义所阐明的。批判地吸取儒家的这些道德内涵，我们就不仅要强调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且要重视一个人要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之人，首先必须是道德之人。只有成为道德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成为了道德之人、自由之人，一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人的禀赋不同，人的发展因而会存在着差异，需要给人们指出发展的阶梯。儒家道德虽然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充分考虑到了人禀赋差异，将理想人格划分为君子、豪杰、圣人等不同层次。借鉴儒家的这一思想，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相应划分为，作为基本层次的“道德之人”、中间层次的“自由之人”和高级层次的“全面发展之人”三个层次。 “道德之人”是每一个人都应成为的人，“自由之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道德之人，而“全面发展之人”是在人格各方面得到充分发展，以至达到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自由之人，这种最高境界通常只有成熟的人通过长期修养才能达到。

一个人要“成人”，关键在于自己的修养。“成人”，不管是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还是成为圣人或君子，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最终也不能靠教育，而要靠自己的修养。儒家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极其重视修身，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如“慎独”、“致良知”、“知行合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这些路径和方法大多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需要吸取这些合理内容，为人们成就“全面而自由发展”之人提供基本遵循。

个人“成人”需要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培育，而各种共同体只有由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构成才能达到和谐和完善，两者处于相互生成、良性互动之中。儒家道德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对于人生存和“成人”的意义，将家与国、天下联系起来。我们要弘扬这种家国情怀，在肯定共同体本质上应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们生活共同体的各种类型和不同意义，尤其要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作用。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 檬